

我说河洛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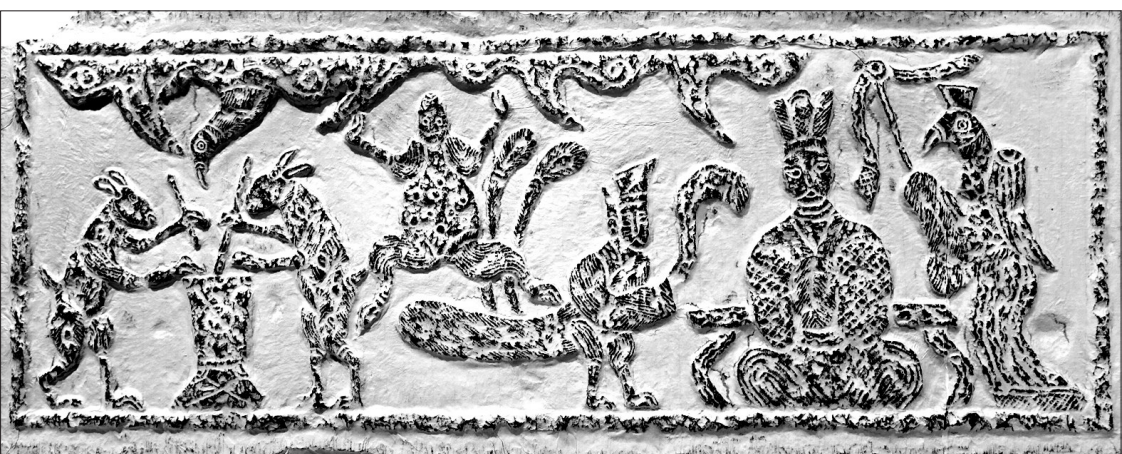
中医西医皆为宝

□寇兴耀 文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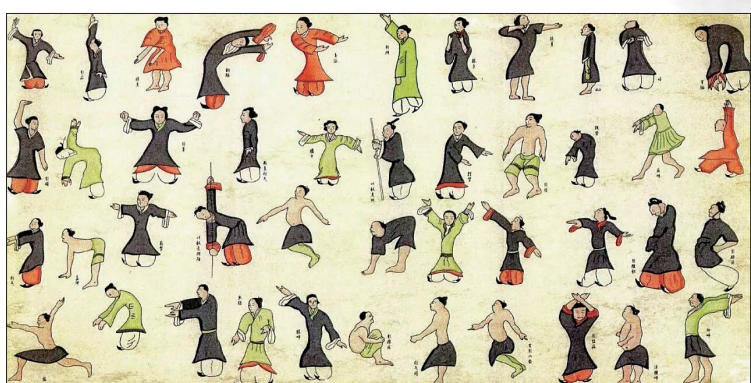
庚子新春,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,不断从各种渠道看到中医药对患者疗效显著的信息,作为中国人,猛增自豪。可看到不少人在褒扬中医的同时,大力贬斥西医,也深感欠妥,担忧这种非黑即白、非优即劣的极端言论,并不利于眼前的疫情防控,不利于长期的医疗保健工作。中医西医皆为宝,扬长避短留精妙,传统现代不对立,携手济世最为好。



洛阳汉画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汉画像石,雕刻着一个人鸟合体的形象,正在给人把脉针灸,这就是扁鹊。他奇异的医疗技术,在百姓心中是神乎其技,犹如仙人,因此才不是凡人的形象



▲洛阳汉画艺术博物馆展出的西王母类画面中,经常出现玉兔捣药的形象,显示出医药在古人中的地位



►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健身养生导引图(复原)。“导引”在春秋时期已盛行,“导气令和,引体令柔”,是一种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,为武术气功和内功的鼻祖

3 “西风东渐”博采众长

西医进入中国是“西风东渐”的一个历史必然。鸦片战争后,眼光敏锐的先贤们认识到我们和西方列强的差距,积极呼吁改革弊政,学习西技,掀起了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,出现了洋务运动以自强救国,提倡国人学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。近代以来,正是由于坚持学习西方科学意识和科学技术,我们现在的物质文明才能和世界潮流同步。

中国自古有博采众长的包容精神,“见善则迁,有过则改”(《易经》)。唐朝时,我们翻译有印度的医药学著作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》,造福至今。我们现在常用的药材和香料肉桂、肉豆蔻、乳香、没药都是从国外引进种植的。唐人就用

肉豆蔻研末做粥治疗消化功能紊乱和腹泻。

现代意义上的狂犬疫苗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9世纪末研制出来的,我们至今仍在使用。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后,1796年,乡村医生琴纳发现了比人痘苗更安全的牛痘接种法,很快传遍世界。人类终于在1979年消灭了天花。谁会拒绝更科学高效的东西呢!

西医的教学体系和西医药使我国的医疗保健力量迅猛提升,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不负先贤们的厚望。

鲁迅曾说“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”。现代医学思维帮我们明辨了传统中医学的精华与糟粕,有利于我们发扬光大这份文化遗产。

4 扬长避短 携手济世

回顾“西风东渐”历史,有一个很大的遗憾:我们在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时候,过于崇洋媚外,忽视了继承发扬我们的优秀文化,以致许多领域都是西强中弱,譬如中医药已经到了边缘化的尴尬境况。这也是我们近年高呼复兴传统文化、增强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。因此,看到微信上种种力挺中医的言辞,个别有些偏激,我也能够理解其苦心与善意。

抗疫战打响,历史将中医和西医推到了一条战壕。西医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物,若使用广谱性的消毒性药物和激素,会加重对病人的伤害。中医有调理平衡、扶正祛

邪的“金刚手”,有丰富的经典单方,却缺乏西医的病毒检测技术和对危重病人的生命支持手段。中西医结合,有效地避免了轻症加重,重症致亡。

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”每一样技术的诞生,都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摸索积累出的宝贵成果。中医药如此,西医药同样如此。我们要借着抗疫工作中中医展示特效的良机,让社会重新认识中医,振兴中医;要继续走中西医结合的路子,让中西医发挥各自优势,取长补短,并存共荣。一切有利于我们健康的技术、药物、理念,都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保护神。

1 中医历史 源远流长

中医药的诞生发展有数千年历史。早在我国的神话传说时期,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佳话。神农氏是农业的开拓者,研制出斧、耒、耜等工具,带领人们开始农耕生产。他还是医药之神,发现一些植物可以治病强身。他冒着生命危险尝试各种植物,甄别草药,一天曾中毒七十次。他在咀嚼咽下一种开着小黄花的花藤植物后,中毒去世,让后人认识了令人胆寒的“断肠草”。

神农氏的故事说明,早在先民们告别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时,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、主观的中医药的研制。其后,岐伯、扁鹊、华佗、张仲景、李时珍等无数

先贤,培育着中医这棵荫护华夏子孙的大树根深叶茂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已善于运用“望闻问切”四诊,精于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等科,名闻天下。早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就问世《黄帝内经》,阐发了人体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。东汉名医华佗善针灸,还能运用麻醉技术做外科手术。为了引导人们强身健体,华佗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的姿态创编“五禽戏”。我年幼时,曾经跟着父亲学过“岳飞八段锦”。现在,武汉方舱医院中的医务工作者组织病情较轻患者做八段锦,以提升正气。祖先们摸索出的“五禽戏”、导引图、太极拳等,造福万代。

2 防治疫疾 中医有方

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“疫疾”。“疾”是普通的、不具传染性的疾病,“疫”指流行性传染病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“疫”为“民皆疾也”,晋吕忱《字林》言“病流行也”。疫病大规模暴发,则为“大疫”。我国古代有记载的大疫有三百多次。

频繁的疫情,无情的杀手,逼迫着古人一直探索抗疫良方。从《周礼》可知,周王室设立疾医,掌管治疗万民的疾病。患者死了要记载死亡的原因,上报官医。这已经有了疫情报警制度的思维。《山海经》载有薰草等七种治疗瘟疫的药物。

秦汉以来,中医学日益成熟。南阳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,有二百余人。东汉末年大疫,不到十年,张家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死亡,其中死于伤寒者占十分之七。张仲景悲愤万分,潜心研究,写成《伤寒杂论》这部医学典籍。

隔离是古人防止流行病传播的主要方法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,就建有“疢迁所”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记载,人们发现身边有人染疫时,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报告官府,患者经医生确诊,就送往疢迁所强制隔离。西汉元始二年(公元2年),瘟疫流行,汉平帝诏“民疫疾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”,通过设置临时性传染病院提供药物,帮助患者恢复健康。晋时规定,当朝臣家有人染上时疫,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,没有被感染的人在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官。南北朝时,设立常设性传染病院“六疾馆”。唐朝有官办的“养疫坊”,也有寺院兴办“悲田坊”“福

田院”收治病人。南宋政府在各地建立“安济坊”,病人依病情轻重居室居住,“以防渐染”。清代官廷中设“避瘟所”隔离感染天花者,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。明清时期,南方许多地方建立麻风病院。

为避免患者遗体成为传染源,历朝官府一般都有掩埋尸体的做法。南朝梁武帝时,郢城大疫,全城十多万口,“死者十七八”。朝廷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,以防止疫疾传染。在宋代,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,以度牒为奖励。从北宋末年开,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,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。

在治疗疫疾上,古人发现可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,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。东汉王充记载这种方法为“以类治之”,以毒攻毒。东晋葛洪的《肘后方》介绍有治疗狂犬病的办法,说把咬人的狂犬杀了,把它的脑浆取出来敷在被咬的地方。这该是接种疫苗的原始思路。

传染病天花让古人谈虎色变。18世纪,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数在一亿五千万以上。我国古籍称天花为“虏疮”。相传它是由战俘带入汉地而得名的。民间俗语说:“生了孩子只一半,出了天花才算全。”中医探索出接种“人痘”的方法,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为材料,主动让未感染的人接触这种毒素,产生抗体。清代朱纯嘏《痘疹定论》中记载:宋真宗时宰相王旦就请医生给儿子成功种痘,儿子活了六十七岁。古人还认识到苗种遗传愈久愈好,“火毒汰尽,精气独存”。

Advertisement for Women's Day (3.8节) featuring products like flowers, kiwi, and various fruits. Includes QR code for WeChat and promotional text for 'Gou Shi Hui' (购时惠).